

G1D1H47/1024

24.

社会风土志

导 语

什邡汉初建县，境内庙宇众多。佛教流衍较久，著名佛教禅宗八代祖马道一出生县境两路口乡，并弘法于县治外北罗汉寺。天主教清代即已传入，亦有一定影响。民间香会庙会也曾极一时之盛，鑒华山香会、鑒西镇药王会等尤具一方特色。各种社会组织，颇形活跃。明末清初，几次移民入境，县内宗祠、家族及其习尚均各有特点。这些都不可不记。它如恶风、陋习、迷信各端，亦撮其要，以揭露其真象，垂戒后世。对谚语歌谣则着意采集，以反映人民智慧和社会风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，革命传统如春风化雨，感人至深，故特设“新风”篇。

第一章 宗 教

第一节 佛 教

佛教在什邡流传甚早，禅宗八代祖马道一禅师，系什邡两路口人，出家于资中，弘法于江西临川、南康等县。曾返什邡阐述禅宗教义，《高僧传》有“马祖还乡开坛说法”的故事。唐德宗贞元四年（七八八年），马祖逝世，葬骨于江西靖安县，有塔，权德舆曾撰塔铭。贞元七年，什邡罗汉寺亦建有马祖塔。唐宪宗元和八年（八一三年），谥马祖为大寂禅师，塔名大庄严。事见《传灯录》。

罗汉寺，是川西宏伟的佛教丛林之一。早在唐中宗景龙三年（七〇三年）即已建造，迭有兴废。明洪武四年（一三七一年），僧了恩重修，并植柏三千株，浓荫蔽日。明崇祯十七年（一六四四年）毁于兵乱。清顺治七年（一六五〇年）重修，至康熙七年（一六六八年）基本恢复原貌，成都知府冀应熊为题寺门，书法秀逸。清乾隆戊申（一七八八年）至嘉庆丁巳（一七九七年）十年间，礼汀和尚觅得嘉定凌云山大佛寺蓝本，聘请成都名塑师曹志伟来寺，塑五百一十八尊阿罗汉像，分列两厢，栩栩如生，蜚声全省；开折传戒，香火不辍，成为什邡佛教活动中心。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六年），道林和尚为置庙产，扩大规模，寺庙占地一百二十亩。

什邡县境还拥有鑒华、九峰、龙居、巢凤诸山，中藏古刹；平原各区，亦散布古庙八十余座，不乏历史悠久的古寺，如回澜乡的慧剑寺，规模宏敞，塑有五百罗汉。缘于唐玄宗时，赐高僧波仑金剑宝钵，传说金剑先飞回寺，因取“以智慧剑，破烦恼贼”的义理，名慧剑寺。

治北有龙居寺，始建于唐代，明成化年间修葺。寺处幽谷中，唐玄宗曾赐额“龙泉古寺”。一称系蜀王孟昶消暑行宫。结构精美。

南阳寺，在南泉公社境。隋帝子杨秀狩猎间，于此得石头佛像，因造香刹，建寺庙，有碑记其事。其它有历史可考的，还有湔氐公社的三泉寺，系元天至正（一三五三年）建，属九峰寺下院，传明陈友谅大将张定边出家于此，清康熙时，鑒山高僧仁让募化重修。

什邡庙宇众多，从碑碣考查，较著名的还有宝月寺（隐峰境）、兴贤院（民主境）、马祖寺（两路口境）、金相寺（洛水境）、顿教寺（灵杰境）、雪门寺（鑒华境）、报恩寺（民主境）、海会堂（鑒华境）等，一般均系元、明时建造。

重大佛事活动多集中于罗汉寺，该寺常住修持的僧人达百人以上，年年有开折传戒的活动（戒期为腊月初一开始，初六燃灯，初十圆满）。清末至民国初，没有中辍，至本世纪二十年代，改为三年举行一次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，以下类推）三月三日，什邡佛学社成立于罗汉寺，聘请能海法师（解放后，为全国佛协副会长）来讲《入般若法门》，修密宗法，邻近各县佛教徒，都来县集会。

民国二十八年十月，浙江金山高旻寺祥瑞法师在罗汉寺宣讲《大乘妙法莲花经》。

民国二十九年二月，于罗汉寺创办佛陀学院，培训佛教徒，钻研佛门经典。后更名为华西佛学院，由中国佛教会太虚大师派厦门闽南佛学院又信和尚来任院长，成都空林佛学院和新都宝光佛学院教务主任玄则等来院任教，先后毕业僧众三期，学员百人左右。是年冬，遵佛制传戒，四方居士前来参加者甚众。

民国三十三年，于华阳县定光寺迎回禅宗印光大师舍利，建舍利塔于罗汉寺内。

民国三十三年，在罗汉寺兴办“六和农场”，辟耕地四十亩，提出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口号，种植烤烟、火麻，建造烘房，僧侣做到“种田、参禅、讲课三不误”。一九四七年，农场停办。

民国三十三年，什邡佛教会由又信担任会长。当时统计全县僧尼及在家佛教徒（指正式皈依的）共有一千零七人。佛教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大乘经典、弘扬佛法，调解内部纠纷。当时由四川省佛教会领导，会址先设于罗汉寺，一九四七年乃移于观音阁。

什邡大庙住持更迭，明末清初以来，均由法嗣相继，尤以罗汉寺为严格，他们源溯于新都宝光寺，尊笑宗密祖为中兴第一代，连续至七代礼汀禅师。民国十五年，由祖庭宝光寺选送演松量福禅师来县主持罗汉寺。后因住持迭替，迭有纷争。

解放后，僧尼还俗成家的多，地方已无佛协机构，什邡佛寺绝大多数已作它用。

第二节 道 教

什邡县解放前最大道观有县城外北五瘟堂和外西三教堂。五瘟堂常有流动来往道士三、四十人。其中除一部分老弱修持者外，有的是短期游方来此歇足的。其它道士则分散居住于乡镇各道庙中。县内道士信奉“正一派”的不出家，呼为“火居道士”或“俗家道士”；信奉“全真派”的则出家，长住道观中。其崇奉老子、东华少阳君的属“南宗”；崇奉吕纯阳的属“北宗”。平日亦有诵拜和以丹散药物为人治病等活动。较有名的道观有县治附近的龙王庙、文昌宫、天后宫、真武宫等以及鑿西镇的真庆宫与上、下火神庙，龙居乡的老君观、蒲氏乡的文昌宫、回澜乡的玉皇观等。道士一般无集中法会。五瘟堂的道士，有一批常为丧病人家进行超度拜忏仪式。

什邡道教组织与省道教会联系不多。民国三十一年，成都二仙庵省道教会忽致函什邡县府：“委任郑俊臣、吴锡三为什邡道教会正副会长”，并拟接管五瘟堂，当即遭到本县全真道士蓝明玉等联名上书反对，以俗家道士不能干预道务。一九四八年，什邡道教协会选出姚成华、蓝明玉等为会长，先后举行过几次集会，全县道教徒约有五十人左右。解放后，已无宗教活动。

第三节 伊斯兰教

公元十七世纪，伊斯兰教穆斯林（教民）、回族摆得安全家及伍姓一家，由湖北麻城孝感

乡回子营迁来什邡永兴场，迄今已历十一辈。其余还有彭、黄、张、穆、周、陈、马、刘、赵诸家，均系陆续从外地迁入的。他们都自认是拥护穆罕默德的逊尼派。清真寺在永兴镇，创于民国三十四年按伊斯兰教规定，每年有三个节日：开斋节、古尔邦节、圣纪（穆罕默德诞辰）。全体教民都得参加礼拜，在外地的也得回寺聚会祈祷，平常是星期五举行礼拜。阿訇先后有彭正清、马林、蓝静修、黄仲琦等，黄死后，无人接替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什邡曾组织回民救国会。

什邡县伊斯兰教是以血统婚姻关系传播的。凡回、汉族通婚，均得从回族规矩，经过讨白（忏悔形式），皈依伊斯兰教，便是穆民。有曾游离该教的，经过讨白，仍可恢复其穆民身分。

现县境内有回族人口二百三十二人。过去百分之八十不识字，有四人识阿拉伯文。解放以来，政治地位和文化程度不断提高。现已有中、小学生一百一十二人，有共产党员四人，共青团员三十人。现有伊斯兰教宗教人员二人，清真寺一处，并办有营业食堂。

第四节 天主教

天主教传入什邡，据《四川近代史》载，可靠时间为明崇祯十四年（一六四一年），其时，有司铎利类思、布格洛、安文思等，通过北京东阁大学士刘宇亮（绵竹人）的关系，来到成都。同年，在四川绵竹刘宅设经堂，当时受洗者三十多人，绵、什各县都有人参加。

法国传教士主持成都教区，于彭县河坝场设书院（称为上、下书院），上书院为中修，下书院为小修，大修院则设成都平安桥。小修院系由法国人谷波兰主持修建，时在清光绪六年（一八八〇年）。清宣统二年，谷由彭县来什邡传教，置田产约八百余亩，并于鳌西镇、街子场、回头寺（教友家）、隐峰乡、禾丰乡（何家营教友家）、慧剑寺、新市镇（徐河坝）、池头寺、龙居乡等处设小教堂。来什邡时，先在北门外老君堂修教堂，后修东门礼拜堂（圣修堂）及附属房舍。从清末至民国初年乃完工，堂内结构精美，并从四川大邑聘请雕工进行装饰，所刻圣教示迹都很细腻，教堂内园林遍植法国葡萄，用以酿酒。谷在什邡除传教外，亦参与社会活动，布施医药；设有“圣修男子小学”及“圣婴院女校”。民国十九年谷病故，归葬成都。继任有王希造、杨国栋、陈治安等。

解放初期，统计什邡县天主教财产，城关镇有房屋五十四间，田地四百三十五亩，登记金额为三万六千元（银元）。经济来源名为西欧教会捐助，实则地租收入甚大。全县当时有教友二千人左右。

解放后，天主教内开展了“三自爱国革新运动”（自治、自养、自传），爱国的教徒，一致反对梵蒂冈教廷干涉，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政府保护。教友死后，仍有沿习送成都市磨盘山“圣地”入葬的。神父陈治安一九六四年病故后，教务无人领导，现有分堂主一人，奉教的多在城关、回澜、龙居等地。

第五节 基督教

基督教派众多，陆续传入川西，在什邡的有：

一、基督教青年会(Y、M、C、A)：一八四四年创于伦敦，主张在青年中进行德、智、体的教育，提倡改良主义。一八八五年由美国传入，并在四川成都建有组织，什邡蠡西地区有求学的青年们参加。

二、基督教女青年会(Y、W、C、A)：一八五五年创于伦敦，开始办职业妇女宿舍，组织妇女进行宗教集会。与“青年会”宗旨同。一八九〇年由美国传入，设分会于成都春熙路。县中从事教育及医务的女士们中有加入的。

三、安立甘教会：基督教圣公会的别称(系音译)意为英格兰的，因圣公会最早发源于该地，又被定为国教，因而得名，什邡新教属此派。据民国三十五年档案记载，基督教安立甘圣公会于宣统元年(一九〇九年)传入什邡，北门外有教堂一所，房屋十八间，经官厅核准，立约为英国牧师马克绪(译音)，被派来什的系英人戈元锐牧师。三十至四十年代，传教士有英人郑克勤、郑美龄夫妇，解放前夕离去。当时基督教友约八十人。

解放后，神职人员离去，县内宗教活动停止。有布道员谢惠祥，一九五二年初，参加县红十字会作医生工作。

第二章 社会组织

第一节 袍 哥

袍哥系封建会道门组织，亦称红帮、洪门、哥老会，明末清初已传入什邡。哥老会头目称“舵爷”，本地人称“舵把子”、“龙头大爷”、“社长”。有值年大爷，闲大爷的区分。还有平地升天的大爷，多属地方名望人士，是奉送的。大爷下分三哥、五哥，又分“闲五”和“执法管事”，执法管事分掌码头事务，或叫“红旗管事”（指清水）、“黑旗管事”（指浑水，通匪）；再下即为七、九、幺等排行，属一般成员。会中分“门”，用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区别其“公口”、“家法”，都有一套严格规矩。

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保路同志军运动中，什邡双盛、两路口、永兴、马井、方亭等乡（镇）的哥老会，都曾举起义旗，参加过围攻成都的战斗。先是广汉同志军的崛起，什邡双盛马得卫（号闯王）也率领袍哥队伍，攻入县城南关，接管火药局，赶走了清朝最后一任知事由从周，推举马井的袍哥大爷许旭山任县知事（时为一九一一年）。后来，四川军政府才委任刘锋来县接任。永兴乡的哥老会，在保路运动中还参加过绵竹侯国治所组织的川西北同志军，攻打安县，取得了胜利。

民国建立，什邡各乡、镇的袍哥“公口”林立，城关有总舵爷杨浑，鑒西地区有老舵爷“墨毛丁”、刘潭等，都较著名。民国时期，尤其是防区时代，哥老会与驻军、地方恶势力沆瀣一气，官匪不分，永兴地头蛇李犇和驻什邡混成旅旅长张煜及其下属的团、营、连长等，均属哥老。民国二十二年城关地区袍哥公口叫“仁和公”总社，下分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五个分社，层层节制，遍及各行各业，各乡、镇保甲也有大小“公口”。民国初至三十年代，什邡哥老头目“宣（慧儒）、马（伯华）、丁（聘如）、徐（乐斋）”四霸，他们利用公口和亲属联姻，形成袍哥世家，逐代交替，扩充各自武力，贩毒窝匪，胡作非为。以后又有号称“十虎”的恶霸出现，他们与地方政权结为一体，狼狈为奸。

民国二十四年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轅曾明令禁止哥老会的发展，但无济于事。什邡县长来元义，去拜会永兴码头，“太爷变成了大爷”（入了流）；县长於笙蔭因不是袍哥，工作上备受刁难；最后一任县长李克刚，刚拢县城，即以袍哥身份疏通各码头，奠定他的社会基础。

三十年代中，第三区范围内的袍哥势力恶性膨胀，宣、马把持永兴、三河地区，极力控制，排斥异己，以至民国二十八年发生枪杀前山防团练局长李韞儒事件，随后又有杀害绵竹县党部书记长廖铁翘（什邡人）和廖氏族入案。山区矿业、林产均为宣、马霸占，民谣称：“李家碾的马骑不得，锣（罗）打不得，鱼（于）捉不得”，意指该区这三家袍哥势力大，惹不得。这帮袍哥首脑，多身兼乡政要职，蓄有亡命之徒，多的数百人，少的数十人，称为“兄弟伙”、“豆芽子”。他们日当公事，夜纵为匪，百姓受害累累。

什邡以永兴、灵杰、鑒西、禾丰、城关镇等哥老势力最强。本世纪四十年代，鑒西哥老

中崛起了恶霸施泽，他和一批乡、镇长相勾结，并与彭县哥老有联系，借“清乡副总指挥”的身分，仗恃其兄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，招纳亡命（爪牙中有十余人即系巨匪），执意挫败哥老会中旧派（永兴帮的宣、马）。民国三十六年八月，发生枪毙永兴乡施家碾马邦贵案，永兴帮连受挫折，酿起双方械斗。袍哥的内讧，苦了彼此辖区的老百姓，每日黄昏，即拉牛入镇避难，甚至避入县衙门大堂，免遭洗劫。次年三月，又发生因小事袍哥枪手杀死国民党什邡特委会情报组长事，尽管特务机关大肆叫嚷，而慑于地方袍哥势力，也只能不了了之。

民国三十八年四月，哥老会部分头目借鑒西药主会期，纠集一起，策划“应变”，阴谋阻挠解放大西南的进军；一九五〇年初，鑒西袍哥小头目伍进之公然聚众鼓噪，包围起义部队师部；还有民主、湔氐、永兴等地哥老（浑水），伙同赵洪文国叛乱，一度骚扰于山区。

人民政权建立后，对参加哥老会的一般群众，阐明政策，不予追究，但彻底禁绝其活动；对哥老会的首恶分子（恶霸），坚决镇压；其它则按情节轻重，分别处理。

第二节 青 帮

亲洪帮（统称青帮）原是明末清初江湖上一个反清秘密组织，后在游民中加强其组织活动，势力逐渐扩大。

青帮在民国二十七、八年间流入县内。初系个人零星去成都、新都、广汉等参加堂口，未成系统，继在什邡城关北门一带也曾有过香堂，为地方恶势力所把持。民国三十至三十六年间有了扩大，几乎遍城乡。以国民党什邡县特委会秘书宋照成（桐）为首，在什邡开设香堂，招收徒弟；并在城关、马井、鑒西、隐峰等地办过几次“赶香会”，称“上小香”，每次办酒席三十余桌；又在城关外北开设“三四商店”，以纸烟业作掩护，作为联络处所。其下属组织，遍及各乡镇，多者三百余人（城关），少则二、三十人，偏僻如红白、八角，也有一至三人，包括本县去外地参加者，全县约一千二百人左右。

什邡青帮系统，由新都传入的属“嘉白帮”，老师为严晴川；由广汉传入的属“江淮泗帮”，老师为吕特夫；由成都传入的属“兴武六帮”，老师为高洪恩、李韞山，后来，什邡大肆发展的也属此帮，帮首即军屯人宋桐，其中以工商界，袍哥、乡镇保甲人员居多。解放后，青帮首恶孙小吴、刘席珍被人民政府镇压。

第三节 一 贯 道

一贯道，又名“中华道德慈善会”，系封建会道门之一。抗日战争期间，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，与特“黑龙会”相勾结，为日、汪效劳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，四川第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训令：“国防部二厅查悉：土肥原谕日本特务部，已派遣特务用黄道会、亚兴会（均系一贯道组织）深入内地进行活动，搜集川、鄂可靠会员为骨干……宜注意防范”云云。

民国二十七年，川康绥靖公署密令：“彭县三河教教主，操湖南口音，凡大教堂下设十

一个小教堂……得悉有刘、卢姓等人活动于什邡、彭县、郫县、温江、广汉等地……”。

日本投降后，一贯道又为国民党控制和利用。一九五〇年，仍有潜伏活动，对各项中心工作，造谣诬蔑，肆意破坏，阻挠道徒自首登记。经深入发动群众，宣传政策，揭露其罪恶活动，始分化瓦解。据什邡道首曾祥智、孟清珍（均女性）交代：民国三十五年，总道首张天然病死于成都时，什邡道首均曾参加护送尸体至飞机场，运南京“国葬”的活动。其后，“一贯道”即分化为“师母派”和“太子派”，都以中统局宗教委员会为靠山，师母孙素贞废除“道长”制，大办“忏悔班”（或仙佛班），大开“普渡”，在川西肆意发展道徒。

什邡最大的支系为曾、孟系统，称为“理天道”、“中庸道”、“孔孟道”，在城关、双盛、禾丰、两路口等地活动；釜西、灵杰、和兴等地系灌县分支“瑶池道”等道首传入。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临近解放时，宣扬“应考”（即对待解放的称呼），采取化整为零法，以纵的联系，转入隐蔽。

解放后，大张旗鼓取缔一贯道，人民政府贯彻执行有关方针、政策，对首恶分子曾祥智判处死刑，其余道首依法惩办。

第四节 红灯教

红灯教属于一种借宗教、迷信活动而聚结的秘密社会组织。据清嘉庆《什邡县志》载：清嘉庆三年（一七九八年），“红灯教自东转北渡过嘉陵江时，人心惶惶，谣言四起……什邡乡练团勇，在各要隘相度地形，分头筑卡，县属边沿，都设盘查，以防教匪的窥伺”。又嘉庆十年（一八〇五年），“清凉教吴忠有倡演邪说，煽惑多人，事泄被获，时讹传为青莲教倡乱，众惶惑恐。”清凉教起事，在县境红白山区。又光绪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年）“时红灯教蔓延各县，暗有习之者，什邡九里埂民尤赤贫，被其煽惑者众”。足见当时白莲教义军进入川西时，“官逼民反”亦有影响。据民国十八年《重修什邡县志》记：“民国十四年六月七日，有悍匪曹皮子，勾结红灯教匪数百人，由慧剑寺至木牌坊，攻入东门外正街，蜂涌扑城，贼匪教师致十人被击毙，复挟持谷司铎（法国人）求援兵。团队恐起外交，追至豹木林而还，贼由广汉遁去”。当时，在毗邻彭县的红岩子、绵竹的火烧埝，均有红灯教活动，并曾一度攻入绵竹县城。民国三十三年，县内两路口乡发生称为“兴隆事变”教案，参与其事的有黎世润、黎万林等，隐藏于双盛乡上泉寺一带，书符练水，与“安县教首郑立富，唐青云等亦有关联。”

民国二十七年十月，什邡马井乡有周天统、官太如与彭县马仕骏、鲁居云等，以红灯教聚众起事，与团保相持数十分钟之久，后被捕，先后判处死刑。

民国三十三年，又有红灯教首王有生、陈忠甫等活动于红白山区，足见该教虽屡遭镇压，依然秘密零星结社，民国间仍未遏止。

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，以谢占清为首，纠集一小撮旧社会的残渣余孽，借“红灯教”名义，进行反革命暴乱，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山清剿部队消灭。一九五七年，复有石天元、黄天榜等，组织“五行军”自称“真命天子”，还秘密诏封“三宫六院”、“将军”、“元帅”，妄图颠覆人民政权，受到严厉镇压。

第五节 同善社

“同善社”即民初的“同善堂”更名而来。民国三十二年，国民党政府曾命令解散，但仍然暗地活动，变为种种异名。其机关设于各地，在湖南化名“望江楼”，在湖北化名“大同祥号”，四川也有“大同祥某县同善堂”或“某县先觉祠”等名目。参加的以年老士绅及商人居多，动机各有不同，有的托名“修真养性”，利用流言，暗中传播“中国必须有真龙天子出世乃得太平……”。后来，入社的分子就日益繁杂了。

一九五二年，以头子邓天元、李乃彬（均已镇压）为首，诡称“李氏复生”，与德阳同善社头目彭问鹤等勾结，在成都、新都、广汉以及县内马井、隐峰乡等地，恢复成员，提升道首，阴谋组织“万灵军”，伺机进行破坏活动。他们还利用一些彩色风景照片，愚弄无知群众，伪称“仙居之地”，“将来功臣都入仙居之所”，进行欺骗钱财、奸污妇女等罪恶活动，经什邡县公安局破获，按律处刑。

第三章 会馆(宗祠)、行会

第一节 会馆、家谱

一、会馆宗祠渊源

在什邡人口来源中，明末清初迁徙入县，“占籍惟楚人最多，粤人次之，江西、陕西、福建人又次之”。清乾隆《什邡县志》对县中“前明土著”则称：“念劫难后，或从本地逃出，或自远方归来，邑中只有四十九姓，一百一十人，计七十三宗……。”随客籍迁入聚居，建有不少会馆，其分布是：

城关地区：玉清宫（文华街）系陕西会馆；万寿宫（文华街侧）系江西会馆；真庆宫系湖广会馆；帝主宫（外南街）系湖北黄州人会馆；南华宫（西外）即广东会馆；川主庙（外西正街）则系本省人会馆。

外乡镇有：江西馆（马井正街）、湖广馆（马井正街）、川主庙（徐家场横街）、真庆宫（徐家场上街）、万寿宫（徐家场下街）、武圣宫（徐家场下街）、南华宫（徐家场下街）。永兴场也有武圣、南华、川主、真庆宫等会馆；街子场有湖广馆、万寿宫、玉清宫等；灵杰场的会馆名称亦同；远至山区的高桥场、八角场，同样亦有会馆一、三座不等。当时各依乡籍，建立福佑神祠，集会场所之多，是移民迁入的实物佐证。

这些会馆的建立时间，一般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，最早为康熙三十七年（一六九八年），到清光绪中期多系培修。这也和清顺治入关后，四川人口从下降到回升，县内人口日渐稠密的发展规律相吻合。

什邡城乡各大族还建有宗祠，声称是“湖广填四川”时，来川落户的族人，蕃衍日多，因此，有的依家谱、族谱，合力出资建造宗祠和分祠，以期敬宗睦族。每年特定季节都有宴会或祭祀典礼，春季有“清明会”，夏季有“夏至会”，秋季有“中元会”，冬季有“冬至会”。届时，凡族人都来宗祠集会，行祭礼。有的大族还具备三牲酒醴，鸣铁炮，用音乐赞礼，十分隆重。有的宗祠筑有戏台，节日中要迎神赛戏，以娱神主，亲友要送礼祝贺。祭祀終了时，都参加宴会，分享祭肉。凡清明、冬至二大节日，除宗祠举行祭祀外，族长之流还要率族中子弟，抬祭品去各家祖宗坟墓祭扫，上标，焚化纸钱，慎终追远。岁暮还有“扫年坟”的风俗。

县中较瞩目的宗祠有：

宗圣祠（城关）为曾姓宗祠；于氏祠在城关南街，洛水、街子场等地均有分祠；李家祠在城关南街，永兴场、余家庵、马井乡、南泉乡、山区茨黎沟等地均有分祠；罗氏祠在城关南街，元石、民主等地均有分祠；欧阳氏祠（城关县衙侧）；杨氏祠在城关西马道，公墓治侧、慧剑寺、安乐桥、杨家庙等地均有分祠；刘氏祠（鲢鱼桥、回头寺、宝月寺、慈母山、高皇庙、纸厂沟、金龙桥、向家沟、马井乡等地均有分祠）；廖氏祠在城关外北，彬山寺左、灵杰、马井、龙家泉等地均有分祠；王氏祠在城关东外，彭家坝、汪家桥、王家花园等

地均有分祠；张氏祠（八角井、观音庙有分祠）；陈氏祠（叶家碾、姜家坝有分祠）；钟氏祠（白鱼河）；权氏祠（圣寿寺侧）；潘氏祠（三岔河）；冯氏祠（磬西乡下街）；夏氏祠在城关东十字，瓦子庵侧有分祠。以上，仅例举大略情况。民国时期，有的集会犹存。解放后，宗祠改作它用，无祭祀活动。

二、家（族）谱、家规例举

不完全统计，县中大姓以杨、陈、周、刘、李、张、王、曾、廖、马、黄、朱、阎、于、施、冯、何、邓、魏等姓为最，考察家谱多系由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广东、山西、陕西等地流入，而以湖北麻城孝感地区占主要，时间多在康熙中叶（一六八〇年左右）。“家谱”是家族的世系，多借托古人中的名门望族，以为同宗，属封建宗法制度产物，但亦可以从其中辨识客籍迁徙脉络。

县中王姓谱记，“清中叶随杨光烜（侯爵）平川西之乱，由成都迁徙入什”，氏族代号“三槐堂”。韩姓来自湖北麻城，有废碑记祖宗入川事。樊、廖诸族“家谱”，证实系由楚入川，占籍于什邡。清嘉庆九年（一八〇四年）什邡修志，曾访寻当时达九十八岁高龄的谭姓夫妇，证明其先世从湖北入什邡无疑。大姓阎氏，清初由湖北占籍什邡徐家场阎家埝，今已属第九代。由广东龙川县入什的冯姓，四大支分散县境，民国三十八年间，老家还有族人来川寻宗认祖，证实同出一支。大姓曾氏，系孪生兄弟来自江西吉安，蕃衍日盛，清什邡县令纪大奎曾作《双桂传》，记其兄弟俩拾金不昧事，曾氏悬匾为“怡怡堂”，以兄弟怡怡相处，传为美谈。大姓张氏《族谱》记，来自“甘肃阶州文县”。李氏大姓迁自陕西。还有分布于县中四平、龙居、濛氏等地的黄姓《家谱》称，迁自江西婺源羊子坝九根松，族中先辈为邛州牧，系前清官吏，见什邡山水繁秀，乃入县定居。西山大姓刘氏，亦清朝前期由楚入什，清嘉庆《什邡县志》载：“邑民刘宗朝由楚入川，发明造纸”，今其族定居西山纸厂沟，已历二十三代了。杨氏更为县中大姓，据其《家谱》考查，主要一支系清代由楚贩马入川，什邡西山一带，杨姓尤多，清乾隆《什邡县志》载为“前明土著”，且指明原西山境内，以朱、杨二姓为最，并有以姓氏命名的“朱家桥”，“杨村镇”。复考什邡土著，原来为羌氏族杂居地区，羌族以杨戩为守护神，故多沿其姓，氏族以老子为代表，沿习姓李，亦有渊源。濛氏山间有党姓，其所祀家神，头挽螺结，沿山还有石穴葬，众指为“蛮坟”，考此类家世，果其为羌氏后裔？待证。后山岳家山，多岳姓，当系兵燹未触及的土著，或避乱入山的。清乾隆《什邡县志》称“客籍迁徙，五方杂处”是可信的。

家规家法本封建家族制度产物，中亦不乏可资借鉴处，择举一、二存考。

如关于丧葬礼节，什邡《杨氏家法》有：“人子固不可俭亲，然致哀而止。葬亲宜卜吉地。以固棺，但不可执福荫之说，误听庸师，坏古墓，占人坟……等弊端。如严加禁戒不听，责以家法；再抗者，送官究治”。

关于婚姻，《家法》规定：“务以戒奢从俭为要”。对于“同姓为婚，婚姻论财，兄弟转房，嫁女为妾，娶娼为妻，女大男小，插香割襟等陋习，族长严加责处，不服者，送官究治”。

其对子弟的约束则有：“先德行而后文章，无力教读者，于农民工贾中任职一业……各安生理，亦不失为良家子弟”。还列：“勤俭为本，勤能治家，勤能守业”，“务令各择本业，不可游手好闲，流荡为非”。还规定：“私行盗窃，决不姑宽，且责其父兄失教”。

“指香结盟，狐群狗党，送官惩处”。“不能加入邪教”。“司皂隶（即公差之流）永不许归宗入籍”。（按以上《家法》所指，有不失为良言的，但认为“皂隶使三代祖宗饮痛幽冥”，其严斥诉讼，力戒子孙不入官场，也有其偏激一面）

宗祠家法，也曾使多少为追求正义和光明的青年受到扼杀，使多少男女的爱情和幸福被葬送，而成为历史前进的阻碍。什邡釜西某氏的子弟，即因倾向自由而被迫服毒自尽；永兴有寡妇某，因改嫁而被惨沉江底。

第二节 行 会

什邡行会同川西各县大同小异。其命名的由来，与各行业有关，有的则托古人之名穿凿附会。在神道立教和互相倾轧的旧社会，有增强团结，以求统一步调的作用。本地有：

药王会：是医药业和医生的组织。他们以四月二十八日为会期。釜西镇届期迎神出，驾极为隆重，百业交流，驰誉川西。

老君会：是铁作业的行会组织。旧社会的铁匠、铧炉、响铜制铧铧的都祀李老君，作为行业代表。以釜西镇、永兴镇行业最为活跃。

张爷会：是屠宰业的行会。流传张飞未从刘备时，一直开肉案，因而屠宰业供奉桓侯。什邡东北门外有肉市街，屠案林立，祀张飞，年有例会庆祝。

罗祖会：传说不一，有称是道教的罗祖，有称满清入关第一个待诏（理发的）为罗祖，并加以神化。旧社会，理发业分散，行会活动无力。

轩辕会：是缝纫业的行会。经营此业的，于当天，或在家，或去塑有黄帝道观祭祀。

大成会：为教师的行会。民国时，祀孔活动犹存，最后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，县长余光煦还领头于文庙举行祀孔典礼。

太子会：为戏剧界的行会。十分尊奉唐王李旦，以团结艺人。县中剧团泰和春，曾在徐家场南华宫戏台举办庆祝太子会，名角杨素云，曹春风等均作表演。

詹爷会：是厨师（水食行业）的行会。旧社会以厨师为“下九流”，组织十分松散。

鲁班会：是木工的行会。县中，木工以师带徒，渊源较久。凡摆会，一乡一镇都很热闹，釜西镇灵官楼杨木匠曾聘请木偶班迎神赛会祝贺。

其它还有：造纸业祀蔡伦；酿酒业祀社康；造船业祀郑和（三宝太监）等。都有其职业上历史性的渊源。

解放前，什邡外北还有为乞丐流居的“栖流所”，虽不同于行会，但其中帮口组织很严。凡本地及外来乞丐，均得投拜“解头”，乃能食宿乞讨。这批流浪人潜力甚大，官府差役也得倚畀；富室土劣办红白喜事时，也要另眼看待。如县中恶霸宣暴牙死去，栖流所乞丐们送以麻布祭幡一道，上书“万娃同悲”，故意以“娃”代“姓”，加以讽刺。宣家也得隐忍张挂，免惹众怒，遭到群众嗤笑。

第四章 风 俗

第一节 婚 嫁

什邡婚嫁风俗大体同于川西各县，过程有问名、过庚、纳采、谢允、接亲、成礼六个步骤。即是男方请媒至女家说亲，女家也去男家周围密访，初步认可，乃约期行聘，双方还礼后乃会亲，再经请庚帖，八字相合，才算肯定。然后择期，开期单，上列加笄、踩斗、出阁、周堂等日期，报女家，称为报期，并办礼品。女方要耗费许多金钱，备办陪奁，于婚礼举行前送男家，称为“过礼”。男家迎亲前夕，有装郎礼，女家则有至亲女友陪新娘，母亲规诫女儿作媳妇的规矩。

正日迎亲，什邡习用花轿，贫家亦备小轿，缀以红绣球，表示隆重，将新娘迎至男家，拜祖宗、天地、亲友，有用桂圆、花生、枣子、栗等喜果撒打，入新房撒帐，唱撒帐歌，饮交杯茶，入夜闹洞房，婚礼告成。有当天或间日“回门”（返娘家），“要三天”或“要九天”（也有当天返婆家）等习俗。以后即转入正常夫妻生活了。

什邡婚嫁，在三十年代以后，也有极少数举行新式婚礼的，当时称为“文明结婚”，披纱，着礼服，更有租用小汽车以为炫耀的。

什邡旧式婚娶还有特殊风俗，表现为花轿去女家时，要以小娃压轿（以示不空），内放烘笼（以示温暖），临嫁时踩斗，撒筷（以示快生儿子），上轿有亲弟兄背上轿的作法。送亲客男女成对，也异于外县，即男女最多不超过八人（此风俗后渐废除，送亲的增加更多，失掉了“要得发，不离八”的原意）。新房铺设，华堂结蜡，都由亲友中“多福、多寿，多男子”的夫妇承担。新房油灯彻夜通明，不许外人触动；新床铺垫所用谷草要成束，不打散；新床的竹笆不能一个，要两扇合一，取“长命不散，无独有偶，和合成双”的象征；新枕中要藏竹筷一双，以期“早生快生”。婚礼的全过程，充满着象征幸福和吉兆，乃至迷信和幻想。

旧社会，婚姻由于是包办代替，弊端很多。诸如近亲结婚（表姊妹）造成子女畸型、夭亡，或不育。富豪之家纳妾，强婚成习，使妇女受无穷痛苦。还有“七出”（无子、淫淫、不事舅姑、口舌、盗窃、妒忌、恶疾）被赶走的规定，使妇女陷入牢笼，备受虐待。有的则因年龄不合，或被迫“转房”（兄死或弟亡后男女勉强凑合）；或指腹为婚，终成怨偶。更有以妇女为媒介，从而掠夺别人的家财。如红白山区一帮恶霸，为霸占山林田地，屠杀全家，仅留妇女一人，勒令“上门”，最为残忍。也有出于礼教束缚，“守节”（望门寡）终生；或抱着“灵牌”结婚；或被“冲喜”逼嫁的。寡妇尤受歧视，不准改嫁，至民国时还如此，即或允许，也不准从正门离开，要从后门或逾墙出去。类似弊端，不胜枚举。

解放后，提倡婚事新办，多数人主张婚事宜简朴，不尚奢华。县内机关单位，厂矿职工，多以茶话会，旅行方式举行婚礼，或邀少数至亲好友从简祝贺。一九七四年，一百零七对新婚男女，在什邡剧场举行集体婚礼，县委领导亲自出席证婚，开风气之先，移风易俗，

影响深远。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间，退还的彩礼达二万二千多件，折合金额达六万五千元；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九年间，自由结合的一万九千七百多对新婚男女青年中，简朴办事的占百分之八十，启婚事新办的先声。县中从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，先后已有七百二十九人，男到女家落户，打破了千年偏见，冲破“重男轻女”陋习，感到“生儿生女一个样”，解除了老一辈思想顾虑。

可是，千百年来旧式婚姻弊端和影响，依然存在，表现为：

一、大索财礼：从“三转一响”（即自行车，缝纫机，手表，收音机）“四大件”（电视机，收录机，电冰箱，电风扇）到“三十六条腿”、“四十八条腿”（指家俱），“八套”、“十套”（指毛呢衣料等），四礼八节，形同勒索。否则“女人接不到手”，把妇女称为“俏货”。

二、大操大办：动辄大摆酒席，大接礼品，造成今日成婚，明朝负债。

三、任意结合、离异。不负道义责任，甚至酿成不少后患，触犯法律。至于拐卖妇女构成犯罪，则已超出婚姻范围。

第二节 丧 葬

丧葬礼节，民间十分重视，人人以此寄托哀思。什邡风俗，凡死者断气后，子女即围绕遗体号哭，并将死亡日期告知亲友，过去一般富室，要出“讣闻”（文）。有取死者衣被抛掷屋顶，登高呼号的，希望“魂魄归来”称为“复”。也有捅开屋瓦，祝愿死者魂魄早升天堂的，相互矛盾，各表心情。为死者沐浴，换新衣，称为“袭”。隔日更换衣衫，叫“小殓”。过去用棺木盛殓，搬尸体入灵堂，置棺材中，叫“殓”，供亲人祭奠。妇人们守灵，见有来祭奠的，“三启三哭”，表示哀痛。“尸在堂，主人不出”，丧家孝子不迎送吊唁人，称为“节哀”、“守孝”。

过去通行土葬。移棺入墓穴埋葬前一晚，举行“家祭”，念“祭文”，“歌诗”，以颂扬死者。还要“烧灵房”（用颜色纸造房火化），希望死者冥中能使用。县内菱西镇施姓和方亭镇林姓所烧纸糊灵房，包括其中陈设、衣物，其状如真，奢豪之风，传为奇闻。丧葬的当天，孝子要缙麻执杖，亲人执绋，引导入墓地，入圹下棺，名叫“窆”（读贬，埋葬之意），然后掩土，叫“复土”。旧俗，丧家于二十七小时后，举行禪祭，意指淡哀了，可以除服，丧服丧器也可以焚烧了。堂上所供灵主之木质方型外壳，三年后乃烧去，名“撤灵”。

本地丧葬旧俗还有：起棺前，请僧道绕棺，执香火香屑撒四周，表示清宅；起棺后，将垫棺土砖掷出门外，并燃烧松柏枝，意在除秽。“发引”（出棺时）前，用雄鸡洒血叫“掩煞”。沿途撒黄白纸的“买路钱”，并用灵幡前导。梓用砖、石筑成，中放棺木，有平地掩埋的，有深坑掩埋的，也有暂厝，另觅“吉地”迁移墓穴的。“拣筋”（拾骨殖）时，用“筋坛”盛骨殖移葬。菱西镇宋姓还用特异的“稀饭椗”，即以糯米用红土陶碗蒸好，复棺木上，成椗掩土，结凝坚固，也可保持永久。葬后三日，行“复三礼”。

本地还有死者七日后“回煞”的说法，亲人届时都要外出回避。

什邡对丧葬一般不重铺张，以尽哀为止，但也有富室借此大办丧事，摆水陆道场，炫耀家财。菱西乡一施姓儿媳因病死亡，绵竹亲眷孙姓来“大打丧火”，估逼活人与死人合棺，恶

习之深，记此垂戒。

解放后，废除昔日丧葬陋规，提倡崇尚简朴，破除迷信。以后，又倡导火葬。据一九七八年统计，火化尸体率已达百分之四十九点九，到八十年代，县中平原地区已经普及。一九八一年，全县火葬率达百分之七十五点二，人们对此已逐渐习以为常了。

丧葬从简，省事省钱，十分方便。县内火化，委托毗邻的彭县、广汉火葬场办理，什邡民政局还备有专用汽车运送。紧傍烈士陵园建有殡仪馆和多层楼房的纪念室，可举行悼念，存骨灰，在釜西还建有公墓。火化及时，费用低廉。对困难户，还规定可从公益金中补助四十元至六十元；从储备粮中补助大米五十至一百斤。如今，至亲好友多以祭幛花圈吊唁。殡葬新风日渐普及。

然而，“十年动乱”中，沉渣再度泛起。在丧葬中大收丧礼，大摆筵席，铺张浪费，乘机敛财，旧的迷信习俗也有抬头。

县内宗教徒丧葬习俗：解放前佛教徒涅槃（死）后，将尸体置于“焚尸塔”内，聚木柴焚烧，然后拣骨殖放入“普同塔”。天主教、基督教则作“弥撒”（宗教仪式）。有送骨灰去成都“圣地”入葬的。回教徒虔诚沐浴尸体后，齐念宗教经典，以超度死者。

第三节 庆 贺

一、什邡在清末民初，古礼有“乡饮”。包括四种仪式：一是当三年大比会考，选拔贤能，由县官领头，举行饮宴集会；二是党正（地方有德行声望的代表人物）在腊月祭祀时，举行乡饮；三是春秋佳日，习射于序（指学校考试），先要举行乡饮；四为年高有德长者举行乡饮。这几次宴会都是较为隆重的，表示尊贤敬老。

二、祝寿。什邡民间，子女对父母尊长的生日，十分重视；父母对子女的生日，也有所表示。一般讲，凡遇满十（四十、五十、六十不等），祝寿仪式更为隆重。子女均应以鞋、帽、衣物、寿蛋、寿面、喜果之属，奉献父母，阖家祝贺。亦有子女为尊长植树祝愿的。平常生日则从简。

解放后，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再重申不祝寿。但积习一时难反，民间仍有祝寿之风。而近时一些人年纪不大，也搞祝寿，殊失尊长的意义。

三、汤饼会之类。农村特重生儿育女后的“洗三”、“打十朝”、“满月酒”等，什邡地区统称为“簸箕会”。届时有庆祝活动，亲友都送小孩衣帽，糯米、鸡、蛋、猪肉等，异常热闹，产子之家也必设筵招待。建（住）新房也要祝贺，名“烧锅底”，亦有借此大肆铺张的。现在有的重蹈陋规，农村尤甚。

第四节 衣、食、住、行

一、衣 着

封建王朝对人们的冠带、衣裳、均有它的规定。民国时期，什邡衣着虽有中山服、西装

革履出现，但当时被视为奇装异服。城镇士绅之流，仍以长袍马褂为主。上层妇女多着旗袍背心，脂粉铅华。农村男女则穿朴素短服，以利于劳动，节日中，亦有衣土布新衫的。后来细布传入，习称“洋纱”、“洋布”，本地土产窄布（家机布）渐被淘汰。妇女着短装，则被叫为“三绺梳头，两节穿衣”，有歧视之意。男人多包白帕，传说是“与诸葛武侯带孝”的遗风。解放后，一改过去习俗，人们喜以“毛式”服装（即毛泽东主席爱穿的服装）为主要衣着，间以列宁服、干部服、工人服、解放军服。五十年代间，曾因脱离实际仿效苏联，市面上连衣裙、“布拉吉”风靡一时。更有因简单理解“反封建”涵义，出现少数老人男子穿大朵红花衣服的现象。“十年动乱”中，提倡“唐装”，以不符人民意愿未能推行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人民思想解放，衣饰也出现百花争艳局面。高档的绣花衣服，皮革服装，人造毛、丝、棉、麻等涤纶类混纺服料，均极畅销，纯毛呢类服装，也供不应求。妇女已从过去手工自作鞋、帽、衣服中解脱出来。

二、饮 食

什邡以稻、麦为主食品，兼及黍、薯、玉米、豆类。沿西山一带，为川辣椒产区，人们味嗜辛辣，家家喜做辣椒酱以及胡豆瓣酱。蔬菜瓜果类甚繁。本地特产叶烟，为刺激性消费品，县中男女老幼均喜吸食。地近绵竹，酒类消耗亦大。过去，一般对于饮食颇重实质而少涉工艺、豪华，故县中无名贵餐馆。解放前，富室宴客，海味席为上。民间宴客，爱摆“肉八碗”、“九斗碗”。因本县气候与成都平原小有差异，稻谷成熟期稍迟，外地放牧鸭群每随谷收季节沿新都、广汉，后达什邡拣拾稻田收割后抛撒的谷粒。“九月谷儿黄”，意指这时群鸭已壮，多就地出售、宰杀。因此，“什邡板鸭”特别肥美，甲于川西。农民赶集饮酒，亦多以之佐餐，还要为家人携回一、二肘。

县中饮业特别兴盛，虽乡村野店，亦多酒旗飘扬。各场镇均有“京果”、“腌卤”、“酿造”、“水食”等业。县城米粉，人人爱吃，成了特殊快餐，人皆称便。过去水产、水果多从外地运来，鱼鲜仅沿河集镇有少量上市。石亭江细鳞鱼（细甲鲤鱼）是县中特产，肉细味美（现因江水污染，濒于绝灭）。大家畜中，以猪只发展突出，一度列为全国先进县。家兔繁殖快。其它家禽也有较大发展。菜牛多靠外地支援。

解放前，米、面加工，主要靠水碾、磬（音类）子。食油、食糖均属土榨。食盐靠外地输入。解放后，兴建起了各类加工业，利用电力或水轮泵带动机械碾米、磨面、榨油、制糖，日用加工食品和原料供应正常。由于就业和双职工人数增加，饮食问题的社会化日益提上生活日程，服务性行业，冷、热饮食店随之发展。农村仍以家庭为伙食单位，工厂、机关、学校一般已食堂化。饮食结构正在进一步起着变革，总的趋势是向多样化、高档化发展，那种仅满足于“填饱肚子”和“初二十六打牙祭”的生活习惯，已成过去。

三、居 住

过去，居住有一定规矩。家庭教育孩子要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…既昏便息，关锁门户、必亲自检点……”。进屋，晚辈要尊重长辈，让坐上方，平辈要互相敬让，致礼。晚辈入宅，应向长辈问好。到人家作客，有其家长在，一定要请别人上坐，不要参越。家人进餐，也要按辈分大小，各坐适宜位置。这是中华民族的好传统，悠久文明的表现，劳动人民谦让有礼的好品德。居住很注意卫生，每天早上打扫住处，妇女还特别讲究厨房和灶台清